

晚明江南民间
艺术收藏
研究



姚
旻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晚明江南民间 艺术收藏 研究



姚
旻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晚明江南民间艺术收藏研究 / 姚旻著.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528-0522-2

I. ①晚… II. ①姚… III. ①民间艺术—收藏—华东
地区—晚明 IV. ①G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5062号

晚明江南民间艺术收藏研究

姚旻/著

出版人/张玮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唐山新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17 千字

2017 年 5 月 第 1 版 2017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8-0522-2 定价: 36.00元

作者简介

姚旻，男，江苏南京人，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修明清经济史、社会史。获博士学位后，进入该校古典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修，主持“清代北洋海运贸易研究”等国家级课题。2008年进入天津博物馆工作，致力于明清时期艺术鉴赏史研究，发表《明代江南民间收藏中的赝品探析》《明末清初徽州书画商人的经营活动》《从〈清仪阁古器物文〉看清中期江南民间金石收藏生活》等专业论文二十余篇。

本书出版得到“天津市宣传文化‘五个一批’人才”培养资金资助



序

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是驰名海内外的文献之邦，文化艺术品市场向称发达，明代中后期更形成了日益红火的民间艺术品收藏市场。万历时，文坛领袖太仓人王世贞说：“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瓷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①同时期徽州休宁的古董鉴赏家詹景凤曾得意地说：“文太史初下世时，吴人不能知也。而予独酷好。……予好十余年后吴人乃好，又后三年而吾新安人好，又三年而越人好，价相埒悬黎矣。”^②明末嘉兴人沈德符总结其时收藏行情说：“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贵，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泔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吴门、新都诸市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

① 王世贞：《觚不觚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1册，第440页。

② 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四，北平故宫博物院铅印本，1947年，第52页。

如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其称贵公子、大富人者,日饮蒙汗药而甘之如饴矣。”沈德符还说:“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盖北宋以雕漆擅名,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迄宋所谓柴、汝、官、哥、定诸窑,尤脆薄易损,故以近出者当之。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橐相酬,真贋不可复辨,以至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①细细体味明后期江南文人的这些话,可以悟出,时人虽然间有异议,但大体上一致认为,明后期江南收藏古玩的风潮以及十分红火的藏品市场,是由苏州文人率先兴起和徽州商人推波助澜的,后来才逐步波及徽州等其他地区。

苏州文人兼具学养和资财,视收藏古玩为修身养性之物事,以拥有古玩为文化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期待着“挹古今清华美妙之气于耳目之前,供我呼吸;罗天地琐杂碎细之物于几席之上,听我指挥;挟日用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之器,尊逾拱壁,享轻千金,以寄我之慷慨不平”^②。苏州当地人文震亨甚至形容当时各地收藏古玩习以成风,以至称为“姑苏人事”^③。

书画古玩市场兴起后,有无古玩,尤其有无元人倪瓒的作品就成为衡量文化素养是否风雅的标志。崇祯十二年(1639),徽州歙县著名书画家吴其贞追忆道:“忆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六《玩具》,中华书局,2004年,第654、653页。

② 沈春泽:《长物志》序,《生活与博物丛书·饮食起居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42—443页。

③ 文震亨:《长物志》卷七《器具·扇》,《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2册,第70页。



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其风始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村程氏所得，皆为海内名器。”^①汪司马兄弟，即汪道昆、道贯、道会兄弟，其生活时代与太仓王世贞同时，可见苏州兴起的收藏之风迅速得到了徽州文人和商人的响应。

苏州等地文人充分发挥其特长，站在艺术品市场的制高点上，开辟工艺品收藏新领域，高自标帜，自高身价，以广开财路；徽州等地商人财大气粗，通过投资新兴的文化艺术品市场，追慕风雅，交结掌握话语权的苏州文人，既抬高社会地位和赢得市场形象，又牟取高倍的商业利润和无形资产，日益兴旺的艺术品收藏市场就在苏州文人和徽州商人的共同作用下兴起于苏州，波及江南，推播到全国，流衍影响于后世。

近年来，晚明时段研究大放异彩，有谓晚明变迁的，有谓晚明变局的，有谓社会转型的。无论怎么评价，其变化在江南表现得最为明显。明后期兴起的艺术品市场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方面。

学界对于明后期江南兴起的艺术品市场的研究，举凡藏品、收藏人、鉴赏人的情形，艺术品的创造、生产乃至作伪样态，艺术品的价格、价值、市场、流转景象，收藏者及经营者的商业竞争状况，文人收藏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方面，可谓成果丰硕，涉及广泛。然而从人文活动史、文化艺术史和社会生活史的角度而言，既有研究仍

^① 吴其贞：《书画记》卷二“黄山谷《行草残缺诗》一卷”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2页。

显得不够系统深入,可以进行学术性开拓和挖掘的空间也复不少。

姚旻博士自进入南京大学,先后在法律系、历史系学习,由本科而硕士而博士,后来又在文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在法学、社会经济史学领域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学养基础,近年更专注于江南民间艺术品收藏史的研究,推出了新著《晚明江南民间艺术收藏研究》一书,寒窗勤读将近二十年,修得正果,实在是值得庆贺的事。作为他的业师,优先通读之后,深深感到,此书在已经较为深入的江南社会经济史和地域人文史领域添砖加瓦,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江南地域史和文化艺术史的研究,在江南历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和文化遗产日益受到重视的当下,无疑富有学术意义和一定的现实参考价值。

全书辟为七章,围绕经济与文化,以人为中心,对明后期的民间艺术品收藏市场作了系统而又深入的探讨。全书系统考察了晚明江南的文物收藏,由文化、经济、社会等多个角度出发,着力客观全面地揭示其发展的整体样貌,尽量透过现象表层而揭示其发展本因与特色,同时直面其发展的一般状态,还原其存在的本来面貌,从而厘清了围绕收藏而产生的各类社会因素间的互动关系,清晰地展陈了晚明江南艺术品收藏市场的基本面貌。

全书从文人生活方式切入,较为深入地探讨了收藏古物、鉴评艺品在明人着意刻画的“闲雅”生活中占有的重要地位,认为明后期江南文人阶层对收藏的热衷程度正与该人群经济实力的发展情况相一致,与其追求“闲雅”的生活方式有关系。作为经济发展的率先受益者,江南的官绅文士将愈来愈多财富用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及情趣生活的营造,在改善基本生活条件的基础上,依照自己的



地位身份、知识情趣等进行了更高等级的生活规划,并最终塑造出一种典型的文人化精致生活模式。无论“治园亭”“教歌舞”,抑或从事收藏,都成为以“闲雅”为名的文人生活的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收藏也不可避免地与财富挂钩,成为收藏者以高尚名目炫耀富贵财力的载体。艺术藏品为藏家家居环境营造之佳物,藏物更往往成为藏家精神情怀的寄托,藏品能够借由本身艺术特性引发藏家感官审美与精神体悟上的跃升,完成物与人之间的共鸣。收藏在彰显藏家经济实力的同时,更能成为其显示欣赏品位以及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晚明江南民间收藏的发展演变历程,足以反映其时其地社会整体经济环境与文化氛围,足以折射出商品市场运作模式以及消费心理变化轨迹,对于我们理解其时士、商等阶层人群间的交往,艺术创作风格的嬗变与演进,以及文化心态的演化都有着极强的参照佐证意义。总的说来,作为寄兴遣怀的媒介,藏物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单纯的艺术领域,而与藏家的艺术体悟、人生际遇发生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这样的论述和看法,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反映出了其时江南文人生活气息的重要方面。

全书更对艺术品收藏与江南文人的居室、江南文人的收藏与旅游活动、收藏家之间的交际交流作了细致系统的考察;对苏州在收藏风气中推广中的引领作用及徽州商人阶层的参与,作了历史性的阐述分析;对收藏家与收藏品、江南人独特的收藏品位、收藏家的资金来源途径等作了多方面考察,认为田产、经营收入之外,润笔所得几乎成为江南文人从事收藏乃至维持生计的主要经济来源。

全书着重探讨了晚明江南艺术品收藏市场及其各种要素,主张明后期的江南艺术品收藏市场,出现了交易价格快速增长及流通速度明显提高等现象,藏物流通速度的加快还对购买者的经济能力、鉴赏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并在商品化背景下导致藏品功能的异化,艺术品的经济价值与效能得到极大彰显,而这种变化的直接结果就是艺术品财富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认为市场化影响了艺术创作者的态度与价值取向,越来越多的文人创作者开始转型,为响应收藏需求而进行创作,那些明代文人书画的领军人物往往也是经营性创作的最重要参与者,为社会需求而进行创作,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明后期江南文人艺术的发展趋向及创作心态。关于收藏家、古董商与收藏品的交易网络,书中除了像前人一样,对显性的或固定的市场作详细考察,更对藏家与商人、收藏家之间的交际交换的无形市场作了开拓性探讨,将这种市场称为“隐性网络”,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意。书中还从江南的书画保护条件、技术手段与艺术的双向追求等角度,对艺术品流通过程中赝品泛滥的社会背景与原因作了较既有研究更为翔实的探讨。

可以说,全书在江南艺术品收藏市场的形成与江南文人生活的价值取向,市场化影响与艺术创作者的互动,艺术品收藏者、经营者及其收藏市场网络等方面,均获得了新的见解。

诚然,毋庸讳言,作者在书中考察到了明后期活跃在江南的一些徽州籍的代表性古董商人,却对江南吴中地区的艺术品收藏家如吴宽、陆完、王鏊王延喆父子、安国家族、王世贞兄弟、钱谦益等人的收藏及其流转活动,大多只作简略的考察,而深入翔实的探求,或许还有待于他日。相信姚晔博士以其厚实的积累,进一步开



拓进取,当能在明清艺术收藏研究方面获得更大的成就。

范金民

2017年4月3日

于金陵定淮门外寓所



目 录

绪论/1

一、“民间收藏”辨析/2

二、收藏视野中的“江南”/9

三、关于收藏史的研究意义与学术回顾/15

第一章 宋元遗绪与明中期之前的江南收藏界/24

一、宋元收藏文化概观/25

二、明中期前的江南收藏/33

第二章 收藏与晚明社会生活/49

一、收藏兴盛与“闲雅”生活之再造/49

二、居与藏——藏家平居生活中的收藏体验/62

三、游与藏——晚明文人旅行中的收藏活动/74

四、收藏与藏家交际/88

五、“苏人滥觞”——苏州在收藏风气推广中的引领作用/97

六、“徽人导之”——商人阶层的参与/107

第三章 藏家与藏物/115

一、雅奇共赏——晚明藏家的收藏兴味及影响/115

二、橐囊深浅——晚明藏家资金来源分析/130



三、藏物之殇——晚明江南收藏面临的诸种风险/143

四、善存之道——江南民间收藏中的藏品保护/153

第四章 收藏高潮背景下的江南藏品市场/163

一、市场的反响/163

二、商品化背景下的藏品功能异化/172

三、市场化影响与艺术创作者的转变/188

第五章 赝品的创造、流播及影响/198

一、晚明江南收藏领域中的赝品/198

二、赝品制造的方法手段/205

三、赝品流播对藏品市场的影响/214

四、辨赝与防伪/219

第六章 藏家、古董商与藏品交易网络/231

一、晚明江南古董市场的地域空间分布特点/231

二、藏品交易中的“隐性网络”/241

三、古董商的角色意义/252

第七章 晚明江南收藏与古董商人——以徽州古董商为中心/264

一、歙县吴其贞家族/264

二、休宁王越石家族/281

三、李日华笔下的方樵逸与吴雅竹等/291

四、其他徽籍书画商/298

参考文献/306



绪 论

在中国,民间收藏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秦汉以降,其逐渐摆脱了早期财富积累的原始性质,而转变成为以艺术审美情趣为主导的特殊活动。在发轫期,士族文人成为该项活动最有力的倡导者。受民间收藏影响,宫廷亦不断对艺术品赋予更大的关注程度及搜藏力度。宫廷收藏与民间收藏平行发展的局面也就此形成。经历了唐、宋以来的变革,民间私人收藏出现了蓬勃发展之势,并在明代后期臻于顶点。在此背景下,作为当时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地区,“江南”也毫无悬念地成为收藏的中心。在其广袤的地域内,收藏成为一种长期存在,并对地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活动形式。在多个领域交织形成的区间内,民间收藏折射出艺术风格、人际交往、商业贸易以及社会风气等多方面的嬗变过程。在开始本书论述前,笔者将分别对收藏活动的“民间性”及与之有关的江南空间范围进行厘定,并对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作一回顾,从而明确有关概念,夯实认知观念的基础。



一、“民间收藏”辨析

一般研究认为,“收藏”意识兴起与财产的私有发展相伴随。先秦时期,“藏”的行为含义已比较明确,对象范围也已较为具体固定。其主要为两类:一是“礼器”。在礼制生活框架内,制造、使用并收藏礼器在当时上层社会蔚然成风。这些器具多被用于祭祀等仪式而被藏于庙堂,或被作为纪念特殊事件的表征而藏于私家,如晋文公曾于城濮之役后受周襄王褒奖,获赠彤弓,“以为子孙藏”。^①一是“财物”。所谓“藏”多指对某种财物的占有,如春秋时鲁国正卿季文子卒,史称其“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②当时,对财物的占有成为“藏”最基本、最主要的意义内涵,以至在先秦乃至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公、私存储财物的处所也时常被称作“藏”,如汉代有所谓“中藏”,至晋代则有“左藏”“右藏”等。

就总体而言,无论是礼器抑或财货,其皆与后世所称“收藏”的对象有相当距离。然而,上述二者或具备“传之子孙”的承续性,或强调了对某种物品的私人占有,这又部分地贴近收藏的行为内涵。因此,先秦时期的“藏”具有了“占有”“传承”的意味,这一时期应可被视作为中国收藏观念、行为的萌芽期。

秦汉时期,文化艺术进入了一个大发展阶段。与之相应,围绕

① 《左传·僖公八年春》,中华书局,2012年。

② 《国语·鲁语上》,中华书局,2013年。



特定种类艺术品而进行的收藏活动也逐渐出现。据史载,西汉景帝时,梁孝王藏有一件壺樽,“直千金”。梁王常告诫后人,善保该物,不可以之与人。虽然我们无法确知梁孝王的收藏原因,但可以推想,对富可敌国的一代诸侯王而言,该物的经济价值绝不是使其心动更一再叮嘱后世善加保藏的主要原因。对于该物器形、纹饰的钟爱,对其艺术成就的激赏,极有可能是促成藏主对其倍加珍视的根本原因。应该说,脱去聚敛财货的目的,而以艺术欣赏为主要内容的收藏活动在此已有其发轫的痕迹。

汉末魏晋之际,社会虽长期处于动荡,但多种类艺术创作却蓬勃发展并取得相当高成就。在此背景下,社会知识阶层广泛参与到艺术的创作与欣赏过程中,并自觉成为杰出艺术品的赏玩与保存者。例如,东汉张芝草书冠绝一时,汉阳梁宣、姜诩等爱其作品,以至“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怠倦焉”。时人多加追慕仿效,以此二人所书作为珍藏对象,“后学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①除书法、绘画外,铜、玉、漆器等的制作也皆达上乘水平。其成果或成为宫廷、士人家庭日常生活用器,或成为其携配玩赏的对象。其如英国学者迈克尔·苏立文在考察汉代玉器艺术特色时指出,“在这个时期,玉器已经失去了礼制意义,变成士大夫们赏玩的器物。对他们而言,玉器中的古意和色泽、质地的美感是深层次的智力和感官愉悦的源泉。从此之后,他们可以赏玩配饰、带钩、印章和其他陈列于桌上的珍玩”。^②

① 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后汉赵壹非草书》,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

② [英]迈克尔·苏立文:《中国艺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2页。